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叶舟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许 新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叶 舟 编写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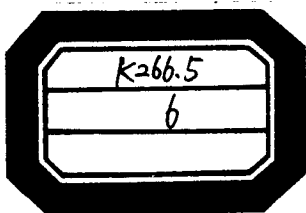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北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822-6/K·118

定价：1.00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叶 舟 编写

目 录

一 蒋介石劫收抗战胜利果实	1
二、“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	4
三 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反独裁斗争	13
四、各界群众的抗暴斗争	16
五、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23
六、工人、学生的反迫害、争生存斗争	29
七、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的斗争	36
八、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欢呼新政协	36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把人民推入了内战的苦海。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他们奋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一条广阔的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进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蒋介石劫收抗战胜利果实

1945年秋，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倡导和人民大众的强烈呼声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抗日合作。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希望看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然而，人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仍然坚持独裁、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政策，积极准备挑起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蒋介石为了挑起内战，想尽一切办法垄断对日伪军的受降权，疯狂地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他极其无理地下命令，让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他命令自己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各地伪军“须切实负责，维持治安，”明目张胆地阻止解放区抗日军队接收沦陷区。

美帝国主义出于侵略和反共的目的，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出动了大批飞机、军舰为蒋介石运送军队和接收大员，抢占敌占区的城市和战略要点，其规模之大，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日、伪合流演出了一场“接收”丑剧。一时间，汉奸、伪军被国民党封为“地工人员”、“先遣军”，有的大汉奸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大员。例如，伪南京市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伪上海市长、大汉奸周佛海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伪江苏省长兼第一方面军司令任援道成了“南京先遣军总司令”。

那些“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的接收大员们，不顾人民的死活，只要“五子登科”（抢金子、车子、房子、银子、衣服料子）、“三羊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争发“接收”财。他们每到一地都是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常常是一个工厂或仓库，门上贴着六、七个封条。经济部说他们应该管；财政部说与他们有关系；军政部说这些东西他们全用得着。诸如此类丑象，不一而足。这些国民党官员利用军事政治权力，侵吞“接收”物资，大饱私囊。他们不仅把敌伪

8年抢掠的巨额财产攫为己有，而且拒绝发还原来属于人民而被敌伪强占的工厂、商店、房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树抢占1千余幢房屋，8、9百辆汽车，1万多条黄金，还有珠宝等物。国民党第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私吞了价值2,000亿元的接收物资。人民把这种接收称之为“劫收”。“收复区”人民经历了8年侵略者的蹂躏之后，又遭到了这些贪官污吏的掠夺，被弄得无法生活，怨声载道，民怒鼎沸。当时上海、南京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在北平也有一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当时拥护蒋介石的《大公报》也不得不承认：“无数千万的人民确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躲到了大后方，尽管有美国军舰、飞机的帮助，要把大批部队运到内战前线，进行内战，还需要一些时间。为了赢得时间，他打出了和平的幌子。从1945年8月14日起，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他这一手段极其阴险。一方面借谈判掩人耳目，暗中备战，一方面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如果毛泽东不去谈判，他就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便找到了发动内战的借口。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早已洞悉，并决心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说：“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但是，人民渴望和平，国民党内部左派

也希望和平。中国共产党更愿意和平建设新中国，所以仍不放弃争取和平的机会。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民主的政治态度。《宣言》指出，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和揭露蒋介石真备战、假和平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进行谈判的决定。8月2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代表团毅然飞抵重庆。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和平谈判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方针，以及必须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但是，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何应钦就密令国民党各战区重印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反共小册子——《剿匪手本》。在“双十协定”签字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发出密电，要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在重庆谈判期间和“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军队以所谓“受降”、“恢复交通”为借口，以收编的伪军作先锋，大举向解放区进攻。至10月中旬，侵占了人民军队从敌伪手中解放的城市31座。内战的阴云笼罩着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

二、“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

蒋介石耍弄假和平真内战的手段，欺骗人民，激起了广大

群众的极大愤慨。一场反内战要民主的群众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迅速兴起。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有效地领导和开展了云南的工作，在昆明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坐落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更有“民主堡垒”之称。所以著名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率先在昆明爆发，点燃了国统区人民反内战斗争的火炬。

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1938年南迁到云南后组成的。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了“群社”，开展进步活动。“皖南事变”后，在白色恐怖下，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组织贯彻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中共南方局“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发展壮大了昆明的革命力量。1945年初，秘密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为广大同学的中坚。5月，正式成立了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在昆明这座四季如春的美丽城市中，进步力量不断地成长着，为即将来到的民主运动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长期以来是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的地盘；他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势力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对于反蒋运动，只要不触及他们的利益，一般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所以当时云南被蒋介石看作是“自由太多”的地方。蒋介石对这种状况早已恨之入骨，认为不能听之任之。抗战胜利后，他便以“受降”的名义，调走了滇军主力，把他的嫡系部队安插进去。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于1945年10月3日命令杜聿明对龙云发动了突然袭击，用武力解决了在昆明的滇军，让

宋子文挟持龙云飞抵重庆，任命李宗黄为云南省政府代主席，并指示他务必消灭云南“三害”。所谓“三害”是指“民主堡垒”、学生运动和地方实力派。李宗黄到任后即狂妄叫嚣要全力“整肃”民主势力，把屠刀指向进步群众。一时间，在云南，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但是这并不能压制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正义呼声。

194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这个号召深得人心。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制止内战。当时，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动员群众，召开反内战时事讲演会，揭露美蒋制造内战的阴谋。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民青”通过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语专科学校四校自治会，于11月25日晚，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那天晚上，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上聚集了6千多人，有大中学生和青年职工。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作了讲演。与会者担忧中国的危局，提出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的口号。晚会开始后不久，忽然周围响起了枪声，电灯熄灭，一片漆黑。国民党第5军邱清泉部士兵包围了校舍和会场，企图以武力恫吓群众，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但与会群众并没有胆怯，他们在枪声中点起煤油灯，继续开会。这时，一个自称“王老百姓”的家伙跑上台去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政府职责所在，理应把发动内乱的乱党剿平”等等。几句话便露出马脚，引起公愤。当场有人揭发，这个

“王老百姓”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调查统计室(即“中统”)主任、特务头子查宗藩。在群众的一片怒斥声中，他只好灰溜溜地由学生纠察队“护送”出场，溜之大吉了。国民党特务的丑陋表演，不但没有达到破坏的目的，反而教育了群众，更加激发了大家为和平而斗争的决心。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反内战要和平的宣言，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最后，大家唱起了《我们反对这个》的歌曲，大会在一片歌声中结束。

在会场外，国民党当局实行了紧急戒严，不许行人通行，散会后约两小时，群众才能慢慢地绕道离去。对这种作法，西南联大一部分“民青”社员和学生积极分子，回到宿舍就发起了要求罢课的签名，以示抗议。

第二天早晨，国民党中央社竟然毫无廉耻地造谣说：“昨晚发生匪警，当地驻军赶往捉捕。”这种诬蔑爱国群众集会的行径，更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愤怒。西南联大等18所在昆明的大中学校学生，在各界群众的支持下，立即宣布罢课，成立全市大中学校联名罢课委员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罢课宣言以及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抗议书。学生们还组织了大批宣传队，走上街头，讲演，撒传单，演活报剧，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揭露事实真相，宣传反对内战的宗旨。许多大学教授、进步人士都纷纷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

反战爱国运动的兴起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杀气腾腾地准备镇压。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宣称“他们(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们就有放枪的自由。”代理云南省主席兼

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命令各校当局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并限期复课，还扬言说：“如不遵令即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反动当局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12月1日上午8时，李宗藩要部下宣誓“为党国牺牲”。随后，国民党省党部、三青团支团部、警备司令部、第5军、军官总队、鸿翔(降落伞)部队的特务、党棍1,000多人分头出动。这些刽子手们手持木棍、铁铲，携带着枪支和手榴弹疯狂地扑向昆明各校。上午11时，云南大学首先遭到了袭击，许多学生受了伤。联大学生闻讯后，立即作了紧急戒备，用桌椅、黑板堵塞通道。不一会儿，佩戴着“第二军官总队”符号的暴徒百余名陆续来到联大新校舍门前，撕扯布告，肆意寻衅。十几个暴徒谎称看壁报，闯进校内，以木棍、扁担殴打学生。学生们不得已，进行了自卫还击，把暴徒推出门外，紧闭校门。暴徒向墙内扔石块瓦片，其中一个暴徒扔手榴弹时恰遇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奋力拦阻，手榴弹爆炸，于再被炸伤头部，倒在血泊中。暴徒反复冲击联大校门，没有得逞，悻悻而去。于再却因抢救无效，当晚死于云大医院。12时左右，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特务和四、五十名军人，带着武器强行闯入联大师范学院，在饭厅前鸣枪，扔手榴弹，师院学生猝不及防，从食堂后窗避入昆华工业学校。暴徒又打破大门，投进手榴弹两枚，炸倒学生多人。联大学生李鲁连不幸中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被暴徒拦劫毒打，当场死去。联大女生潘琰在抢救受伤同学时被手榴弹炸伤，一名特务穷凶极恶地用尖头铁棍向她猛刺。潘琰

伤势过重，也于当天下午逝世。潘琰是一位坚强的中共党员，1938年入党，在湖北建始女师读书时，任地下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皖南事变时，党组织通知她离开建始女师，隐蔽下来，待形势好转，组织再派人与她联系。她离开师范学校后，经恩施到重庆，最后考入西南联大。为了严守党纪，她没有随便找地下党联系，直到她牺牲时，还未恢复党籍。但她始终积极参加一切进步活动，默默地为人民的事业做贡献。那一天，还有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为救联大同学，被弹片穿入脑中而牺牲，年仅17岁。在这次流血事件中，牺牲了于再老师和李鲁连、潘琰、张华昌三位同学，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这就是“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人民为死难者举行公祭。烈士的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从12月2日起，白天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吊祭人群，其中有各校师生、工人、农民、军人、市民、工商业家、地方绅士以及宗教界人士。在一个半月里，参加公祭的有近700个团体，约15万人，占当时昆明人口的一半。灵堂上陈列着烈士的血衣。灵堂四周悬挂着用大字抄写的惨案实录，陈放着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每一幅挽联都是血泪的控诉，也是战斗的檄文，它们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法西斯罪行。挽联中写道：

“名为民主，实际独裁，不啻秦始皇、希特勒
再起；

本是内战，偏说内乱，无怪关麟征、李宗黄
杀人。”

“以学生为仇，以人民为匪，屠杀不遗余力；
与敌寇为友，与汉奸为朋，宽容唯恐不周。”

“以特务党棍治国，以军阀治国，以独裁治
国，民国乃成地狱；

以炸弹木棍杀民，以刺刀杀民，以枪炮杀民，
学府竟为屠场。”

“学生一片好心肠，争民主，争百姓自由，虽
死犹生，我们永远纪念你；

官府万般臭罪恶，为独裁，为一党专制，纵生
若死，大家务必消灭他。”

.....

当时，郭沫若悲愤地写下了《进步颂》，以辛辣的诗
句嘲讽国民党的暴行，他写道：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

闻一多先生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抨击反动派，颂
扬民主爱国精神，他疾声高呼，“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

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

血的事实教育了全国人民和青年，过去还有些人看不清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对蒋介石尚抱有幻想，经过这次血的洗礼，他们也开始觉悟了，懂得了是谁要打仗，是谁不要和平。懂得了要争取和平民主，只有团结起来投入斗争。

为了扩大宣传，昆明学联在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出殡。学联决定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不呼口号，不贴标语。那一天，送葬的群众多达3万人，声势浩大。人们高举着挽联，沿途散发宣传品。每条大街上都设有路祭亭。四烈士的遗体被安葬在联大校园里。闻一多教授在安葬仪式上发表讲演，他说：“凶手没有怨，我仍要追他们到海角天涯……这血债是要还的。”3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我们将以更坚定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

“一二·一”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援助以昆明学生罢课为标志的国民党区域内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解放区青年和国统区各大城市中的民主力量响应这一号召，都举行了声援活动。从12月9日起，重庆各界人士连续3天为四烈士举行公祭，沈钧

儒代表救国会主祭。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1万多人举行公祭大会，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组成。宋庆龄送了“为民先驱”的横联。大会通电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要求立即实现蒋介石许下的“切实保障人民自由”的诺言。广州、青岛、天津、南京、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先后爆发了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群众运动。在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关麟征“自请处分”，把李宗黄调离了云南。

“一二·一”运动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周恩来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运动未完成任务，由‘一二·九’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一二·一”运动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剥去了他们假和平假民主的画皮，教育了广大群众，并为以后国统区内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一二·一”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收复区”的青年学生同反动派进行了反“甄审”争读书权力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宣布原沦陷区的学生、教职员为“伪学生”、“伪教师”、“伪职员”，必须通过“甄别审查”，否则，学生不承认学籍，教职员不能聘用。这个毫无道理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自尊心和切身利益，激起了原沦陷区学生的强烈反对。

1945年10月间，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成立了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作为公开出面领导反“甄审”斗争的机构。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先后召开了4次反“甄审”大会，并出版刊物揭露所谓“甄审”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北平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各地的响应，天津学生迅速行动起来，在1945年12月中旬成立了反“甄审”委员会和天津市学生会，并领导6千多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种种阻挠，包围了教育局，天津教育局长不得不作出让步。上海学生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人民无伪！”“我们要读书！”1945年1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到上海，学生们闻讯立即组织起来，前往朱家骅住处请愿。朱家骅竟然大放厥词，说沦陷区的学生在伪立学校读书，就是承认伪政府，如不惩办是说不过去的。这种极为荒谬的论调，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怒，他们纷纷上前责问道：“谁使我们的同胞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受尽敌人的折磨？不错，沦陷区有着卖国的伪政府、伪军，但学生可有伪？人民可有伪？”1946年2月，蒋介石到上海，上海学生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始终没敢露面。各地学生为反“甄审”举行了多次的游行和请愿，各界人士都给以了同情和支持。这次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政府被迫完全承认了他们的学籍。

三、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反独裁斗争

“一二·一”运动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

民主运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参加的人不仅限于学生，广大的工人群众和中间党派的部分成员也积极投入到斗争行列中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不断发表宣言、通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政治民主，要求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中间党派的代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共同努力，使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人民欢欣鼓舞，可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指使特务制造“沧白堂事件”，殴打在重庆，沧白堂向各界群众介绍政协会议进展情况的政协代表。这还不够，又于1946年2月10日，制造了“较场口血案”。那天在重庆较场口，20多个团体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推举李公朴、郭沫若等5人为主席团。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扰乱会场，打伤了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和新闻记者60多人。李公朴被打得最重，周恩来闻讯立即赶来，用自己的车把他送到医院，方才脱险。第二天，周恩来去医院看望他时，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受点伤算什么！”

较场口事件之后，蒋介石对民主力量的恐怖手段更加升级，魔爪伸向全国。1946年2月间，北平军调部被冲击，中共办事人员被殴打。3月间，西安的18集团军办事处被袭击，《秦风工商日报》社营业部被捣毁；在沈阳，中苏友好协会被封闭；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将军被刺杀；在济南，6名中共党员被捕；在南通，7名进步青年被暗杀。4